

黃埔將帥

第五部分 黄埔溯源

黄埔军校的历史变迁

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共同的心血

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跌跌撞撞地摸索前行，像在寒冬腊月里冒着呼啸凛冽的寒风踽踽前行，有过成功与短暂的喜悦，更有过一次次惨重失败的孙中山先生，在他陷入苦闷徘徊彷徨之际，俄国人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孙中山面前，孙中山顿时犹如久旱不雨的土地突然降下了甘甜清凉的雨丝；犹如深山老林里挨冻受寒之时突然有人雪中送炭。中国共产党像一脉新鲜的血液注入孙中山的心田，滚烫的热情温暖慰藉了孙中山饱经沧桑的心。黄埔军校的创建是孙中山几十年血雨腥风生涯中惨重失败所聚凝的果实。

没有人能意料，当年那个毫不起眼的海边小岛上所创立的这所军校，竟然走出了彪炳青史的屡建赫赫奇勋的元帅，走出了叱咤风云纵横疆场的一个个生龙活虎般的猛将儒帅。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的心血共同铸就的辉煌工程。黄埔军校因为她的弟子的将星灿烂而永远大放光芒，她的弟子又因母校的神奇魅力而脸上添光，眼里盈泪。

孙中山的迷茫

在中国近现代史，孙中山无疑是排在显著的位置上。

他的不屈不挠精神，勇于探索真理的勇气，即令他的敌人也感到

敬仰。1925年,当他在与之战斗的北洋军阀的老窝北京逝世后,甚至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也准备举行国葬以表示悼念。由此可见,孙中山崇高的人格力量足已影响世人。

但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对他的批评。

白玉有瑕,纵使伟人也不例外。

纵观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及时地建立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武装,他时而利用会党,时而发动新军,就是没有耐心培养建设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是“借别人的窝,孵自己的蛋”。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这一错误倾向愈益严重,当共和国的象征国会和约法遭到北洋军阀的粗暴践踏时,孙中山怒不可遏,登上了起义的军舰开到了广州,在那里举起了“护法”的大旗。

但是,孙中山的策略没有改变,他仍然希望借助于一个军阀来打另一个军阀。几年辛苦下来,他心血耗费无数,希望全部落空。得益的却是那些军阀,一旦他们满足了利益,就立即握手言和,沆瀣一气,直恨得孙中山破口大骂:“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孙中山深恶痛绝北京段祺瑞的卖国行径,怒斥5月16日和19日与日外务大臣本野一郎签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出卖东北矿山、森林等主权的段祺瑞政府,孙中山也与南方假共和的官僚们分道扬镳了。不少与他曾志同道合的追随者经不起革命风雨的考验,与敌人同流合污了,孙中山显得“孤苦伶仃”。但却有广大的民众站在他一边。

孙中山第一次护法失败后居于上海,“救国之心未尝少懈。”他一边着力于“整理党务,巩固实力”,命令粤军将领邓仲元、许崇智加紧训练军队,打算继续作战。“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使孙中山“不胜痛心疾首”。残酷的现实令孙中山感慨万千,在推翻专制,创建共和之后,“本可以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

登中国于富强之城，跻斯民于安乐之天”。可“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或认为孙中山“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或“以思想错误而懈志”，分崩离析现状日益严重。孙中山的追随者很大一部分“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势必导致“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当孙中山被迫将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之时，民间盛传这样一首民歌：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狼称霸王。“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二十年如一日”千辛万苦得来的革命果实便轻而易举丢失了，共和国政府在革命党人手里只存在 91 天，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怯懦性暴露无遗。孙中山怎能不忧心忡忡？

1919 年 5 月 4 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给正在坎坎坷坷中摸索救国道路的孙中山莫大的启发与鼓舞。他热情洋溢颂赞道：“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孙中山积极营救爱国学生，多次接待在上海的各地学生代表，以亲切慈爱的帮助来激励学生的爱国活动。

10 月，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指定居正为总务部主任，谢持为党务部主任，廖仲恺为财政部主任。孙中山为了再次开辟革命策源地，收复广州，在海外积极募捐筹款，同时于 1919 年秋至 1921 年夏多次派得力助手朱执信、廖仲恺到福建漳州与陈炯明商讨粤军进伐桂系事宜。

1920 年 11 月 25 日，孙中山离开上海，与夫人宋庆龄等人于 28 日到广州，次日重组军政府。1921 年元旦，孙中山在军政府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纪念集会的讲话中指出：

“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继何，即建设正式政府也。盖护法不过矫正北方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组建军政府的孙中山高瞻远瞩，不仅借助军政力量迫使北

方政府恢复南京临时政府国会与民之约法,同时又“扫除污秽不堪之北京政府,建设良好干净之正式政府”。

4月7日,非常国会在参议院院长林森主持下,召开了参众两议院联合会,一致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222张选票中,孙先生以218票当选为非常大总统。

此时的粤军军阀陈炯明自将桂系势力驱逐出广东之后,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表面上与孙中山以礼相待,实则是心怀鬼胎,与孙中山同床异梦。他的如意算盘是独霸广东为己,而架空孙中山。孙中山主张北伐,陈炯明则将军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陈炯明与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约好,当孙中山率军北伐之际,陈赵两军联防自治互不侵犯,与孙中山北伐目的南辕北辙。孙中山选为非常大总统后,赵与陈暗中勾结,湖南省极力反对孙中山。

5月5日,广州全市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各届团体及几十万市民敲锣击鼓欢呼游行,顿时间旗帜飘飘鼓声震天,孙中山在德宣路原督军署改设的总统府就职。就职后,任命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孙廷芳为外交部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廖仲恺为财政次长,伍朝枢为外交次长。

桂系自投降北京政府之后,陆荣廷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粤边防务督办,谭浩明则成了广西督军,广西省长为李静城。陈炯明密电谭浩明:“各守边防毋相侵犯。”

但因唐继尧想图广东,陈炯明只得反击自守。平定广西后,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可陈炯明背道而驰:他想雄据两广,反对北伐。陈立即与湖南赵恒惕、洛阳吴佩孚勾结,不肯赴前线指挥作战。

11月9日,孙中山在广西桂林设大本营。蒋介石于23日将亡母安葬后却接到孙中山“节哀速来臂助”电而迟迟不动身。经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轮番催促,才于12月22日抵广州,后于次年1月18日到达桂林大本营,被孙中山任命为第2军总参谋长。

此时,陈炯明在老巢加紧勾结吴佩孚,指使湘军总司令拒绝孙中

山北伐军过境。1922年3月21日,陈指使其一个营长陈少鹏买通奸细在广州沙头广九车站杀害了孙中山得力助手、粤军参谋长兼粤军第一师师长邓仲元。蒋介石心里马上清楚:陈炯明即将叛变。蒋主张先讨伐陈炯明,然后再北伐,但孙中山坚持争取陈炯明北伐。

陈炯明的刁难阻挠活动变本加厉。他半年多时间竟不给军政府半弹一粟,置孙中山累催数电于不顾。已经面临山穷水尽的孙中山只有将广东省银行借的2百万元花得精光,陷入粮绝弹尽的窘迫境地,陈炯明置若罔闻,爱理不理。气愤之中的孙中山于4月21日免去陈炯明内务总长、粤军总司令及其广东省长三职,粤军改由大本营直属指挥,但仍留任陈炯明的陆军总长之职。

陈炯明气得满脸横肉鼓凸。解职当天便率领总司令部及省长公署一班人马回其老家惠州西湖百花洲蓄意谋反。

22日,蒋介石劝孙中山进攻惠州石龙,消除陈炯明患祸。只想北伐的孙中山不顾及陈炯明的“蓄意反叛”。湖南省不准通过,孙中山改道江西。

23日,蒋介石陪同孙中山回到广州,依旧想争取陈炯明北伐,派人劝陈炯明回广州。

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反叛策划的陈炯明如何肯回?

一心想着去修其母墓地的蒋介石不顾孙中山的恳切挽留,辞去第二军总参谋长职务,当晚离开广州,回到故乡溪口时已是28日。

5月6日,孙中山与胡汉民、许崇智赴广东韶关,设立北伐大本营。很快指挥北伐军长驱直入广西。

此时,后方广东却混乱不堪。陈炯明部将粤桂边防督办叶举统领的50多个营窜进广州,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扰乱百姓,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25日,蒋介石急电胡汉民、许崇智、汪精卫,提出了“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建议。6月1日,蒋介石感到陈炯明叛乱在即,又致信许崇智:“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若犹豫不决,迁延

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

孙中山依旧要圆他的北伐梦，他吩咐胡汉民留守大本营，于6月1日带少数卫队由韶关回到广州。

火车到新街四站，有一个叫邓三伯的华侨急忙告诉孙中山：“陈炯明在惠州召集他的爪牙，频频开会，有谋乱企图，不可直到黄沙，改由其他车站下车，免受陈炯明暗算。”

随行的人员闻听后，纷纷劝说孙中山还是谨慎行事为好，免遭不测之祸。

孙中山没有想到陈炯明会不择手段地对他下毒手，凭以前的交情，不至于兵刃相见流血涂地。他不紧不慌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以诚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

6月1日，廖仲恺在自己劝说陈炯明迷途知返，自己受逼无已，朝难保夕，而陈炯明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向孙中山密电：叶举等部全屯集省城及白云山等地，将有异动，请先生暂归省垣，以便镇慑。孙中山不顾胡汉民等人劝阻，亲自回广州。廖仲恺也提醒他提高警惕，可孙中山为安定前线军心及后方人心，顾不得许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孙中山由黄沙站下车，坐上由海防司令陈策所派兵舰到天字码头，随即上岸改换汽车，驰回总统府。3日，孙中山带卫士马湘等从越秀楼往震武楼、文澜阁多处巡视，在越秀楼他看到有士兵在墙上凿枪眼，立刻派侦缉队长调查清楚总统府附近驻军人数及番号。

6月2日，孙中山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蒋此时正大张旗鼓准备着14日其母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典礼活动，忙得不亦乐乎。

6月中旬，陈炯明、叶举在石龙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讨论叛乱军事部署，决定逮捕人员，廖仲恺为首当其冲人物。15日，陈派人将廖“请”到兵工厂商议要事，下午强迫廖先生乘广九火车到石龙，陈炯明回广州之时，将廖羁困于石井兵工厂内，廖开始了囚徒生涯。

6月14日，夜里11点，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接连

打电话报告陈炯明叛变动态,情况十分火急。孙中山依旧不相信陈炯明叛变事实,他告诉魏邦平等:“无论如何我不离开,我只知为国家,为民族,从来不为个人谋利禄是人所共知的,陈炯明何至要谋反?”

晚 12 时,林直勉、林树巍又匆忙报告:陈炯明夜间 1 时炮轰总统府,危急万分,请孙速离,在拘捕廖仲恺的次日凌晨,叶举、洪兆麟部奉陈炯明命令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轰炮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危急之中在卫士的护送下,幸免罹难,旋登永丰舰,指挥海陆军警平叛。蒋介石在孙中山累次电催之下,于 29 日来到永丰舰。孙中山欣喜万分,谓外国记者:“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 2 万援军。”蒋在孙口山危难之中“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7 月 29 日,北伐的胡汉民率兵在韶关一战失利,北伐军全线退却,于 8 月 6 日分别向江西、湖南转移,北伐军已被截成数段,且彼此中断联络,不可能再收复残兵另起攻击,也不可能集聚力量回师讨贼。9 日,孙中山只有决心暂离广州,偕蒋介石、陈策等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由广州赴香港。

8 月 15 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向全国公布陈炯明祸国殃民作乱纵兵的叛乱行径,第二次护法运动又遭到沉重失败。

陈炯明叛乱给广东带来了巨大的浩劫。总统府在炮火中毁于一旦,政府官员遭受血腥屠戮,许多党政案宗及财政部各款类被洗劫一空或付之一炬,陈炯明将孙中山指示廖仲恺的积极联俄电报窃取后公开在香港报纸上刊发,以此来诬蔑孙中山联俄,而向各帝国主义邀功请赏。不仅如此,陈的军队自 6 月 16 日叛乱后,放纵士兵大肆奸淫妇女,抢劫财物,纪律松弛,弄得民怨沸腾,搞得广州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这是“广州自明末以来,二百七十余年”所没能有过的“大劫”。

更使孙中山痛心疾首的是,孙多少年来呕心沥血所凝聚而成的关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著述笔记手稿本全在越秀楼内化为灰烬,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被烧毁,损失惨重。孙中山大声疾呼:“凡有血气,

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孙中山与廖仲恺作为这场灾祸里万幸得以生还的革命领袖，更是心酸阵阵。

孙中山经过这一次创伤，不仅是身心还是精神上都憔悴了不少。他为之孜孜以求，为之舍生忘死，为之东奔西突，为之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不但没有因为他的千辛万苦而曙光显显，反而是阴霾重重风雨飘零，孙中山陷入了自投身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迷茫之中。

黎明的曙光

正当陷入困境的孙中山心绪郁闷之际，正当孙中山正在绞尽脑汁为被封建官僚军阀破坏得伤痕累累的共和政体的复原而孤军奋战之际，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乌云沉沉、阴云绵绵的天空突然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不禁令孙先生感到了一股春天般清新而煦暖的希望正在涌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于1917年11月7日诞生了。这个苏维埃政权给了孙中山极大的鼓舞。孙中山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若俄国现在之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正在国际帝国主义企图剿杀新生的政权时，孙中山于1918年于上海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早就与苏联有联络的孙中山在举步维艰一筹莫展之际更加“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孙中山在永丰舰避难之时，便要助手陈友仁转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他认为今后中国革命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就是苏联。

孙中山的思想变化，同列宁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列

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同时也给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党的奋斗以极大关注。中国革命每有重大胜利与重大挫折,列宁都要忙里抽空或赞颂或指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之后受到严重打击,向苏联求援,列宁也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渴盼中国革命早日成功。

早在1920年秋天,孙中山第一次见到了列宁派来的代表,陈独秀将共产国际远东局使者维金斯基介绍给了孙中山。孙中山与维交谈,最关心的是关于俄国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如何把中国华南的斗争与遥远的俄罗斯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提出要求与苏联建立电台联系,希望能在海参崴或满洲里一带建立大功率电台,以便与广州联系。

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与列宁所派代表马林会见,双方经过三次畅谈,孙中山心情愉悦,马林在中国作了一定考察之后,感到中国现况与他所设想的差距较大,他认为香港英国当局不会允许广州革命政府之成立与发展,陈炯明与孙中山不是一心一意的。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是要有一个联合各界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好党才好进行革命;二是最好办一个军官学校,组成革命的武装核心。孙中山连连称是。

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马林于1922年4月,又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双方会晤有五六次之多,孙中山向达马林表达了他对苏俄的友好感情,说他积极与苏俄建立联系。孙中山与苏俄之间不是蜻蜓点水式的泛泛之交,而是他经过再三思虑所作出的一种明智又必要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应运而生,这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成立的一个政党,成立大会时除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及巡捕的搜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似乎是轻盈的小雨落在湖面上没有什么响声,但这却是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照亮着大地的一角、一旦它遍地燃烧起来形成燎原之势,这个腐朽堕落的旧社会将被化为灰烬。

真正为黑暗中跌打滚爬的人民大众指明前进方向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背景下,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军阀的统治,像两座大山沉重地压迫着千千万万中国民众,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刻不容缓的大事。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之最低纲领。8月,中共中央全会决定与当前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接触,以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

李大钊先生于1922年8月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林伯渠也参加了会谈。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建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非常振奋,感觉到有一股暖流涌入他的心海,他笑逐颜开,脸上泛出了喜悦的神情。他热切地希望李大钊这样的人杰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欣然答应,由张继作介绍人,孙中山亲自立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中共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人也纷纷由孙先生立盟,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自1922年8月到上海后,加快了联俄的步伐。8月25日,他在上海寓所会见了苏俄驻北京使团团长越飞的代表马林。近几个月内与马林多次会谈。当时孙中山正设法努力收复广州,他希望越飞的军事随员A·I·格克尔上校到上海,以向上校询问军事事宜,且电催蒋介石速抵上海。

9月下旬,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与夫人何香凝等离沪赴日本,表面上是去参加北京政府驻日本代公使廖恩焘家第六女承麓与许崇清10月在东京举行婚礼,其实是与苏俄代表越飞及其随员谈判中俄合作,与东京的国民党人联络一系列重大使命。只是由于苏俄代表因尚在长春与日代表谈判日军从萨哈林撤兵等问题而破裂,苏俄代表未能赴日,廖先生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1923年1月17日,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南下上海。孙越两人进行秘密交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这是孙中山彻底抛弃对帝国主义幻想,正式确定“联俄”政策,公开与苏联结盟的标志。

越飞为了进行日苏复交谈判及顺便治病飞往日本。廖仲恺抓住这次有利时机,受孙委派,以带女儿廖梦醒赴日治病为由,与越飞诸人同乘亚洲皇后号于2月1日抵东京。由于越飞病情加重,廖多与其秘书谢瓦尔斯龙等会谈,只有当涉及重大问题时才与越飞直接洽谈。他们会谈的中心问题,是进一步讨论苏联政府对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态度及政策,探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中苏联合反对帝国主义,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军校,打倒军阀,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苏联废除以前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22年9月4日,他邀请包括中共领导成员在内的上海国民党53人开会,研究改组国民党问题,马林也应邀出席了会议。6日,会谈成立了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包括共产党在内共有委员9人,陈独秀等共同草拟了国民党党纲和总章。

由于盘踞广东的陈炯明部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地在广州奸淫掳掠胡作非为,使广东人民对陈炯明匪兵有着刻骨仇恨。要求孙中山急速讨伐陈炯明。从1922年10月18日到1923年1月16日,不可一世的陈炯明部不堪一击,纷纷倒戈反正,陈炯明势力被瓦解分化,率残余窜逃惠州、潮梅、汕头及琼崖苟延残喘。

孙中山即任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代表,在广州行使总统职权,胡兼任广东省长。原陈炯明叛军将领洪兆麟、翁式尧在陈炯明指使下投降,他们企图时机成熟便从内部配合陈消灭革命势力。

1923年1月,孙先生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改善工农生活等新的方针。宣言中的一些内容是孙中山几十年来在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历次宣言中所见不到的。《宣言》说明孙中山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及帮助下已在思想上突破了资产阶级的局限,知道要迫切解决无产阶级当时在政治经济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提出今后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证明他已认识到只有依靠广大劳苦大众方能完成国民革

命,摧毁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腐朽统治,这是一个明显进步。

2月17日,孙中山路经香港,于21日到达广州,在滇军让出来的东郊农业实验场设立大元帅府。3月1日,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任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胡汉民为总参议,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程潜为军政部长。6月中旬,广州局势算稳定下来了。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改善工农生活等新方针;一、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的地位;二、实行普选制度,使群众“直接行使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各权”;三、确定人民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居住、信仰的自由权;四、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造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及地价税法。

宣言中许多内容是昔日孙中山在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历次宣言中所没有的。《宣言》将无产阶级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说明在中共与俄共的影响下,孙中山已经完全突破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孙中山先生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官僚军阀,只有依靠广大劳动群众才能完成。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一次质的伟大的飞跃。孙中山完全从以前那种只晓得从华侨当中捐款,依靠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发动革命的胡同里走了出来,从而走上了一条以工农为主力军的革命大道。

1923年10月24日,国民党设立改组国民党的执行机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中央执委会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胡汉民、林森、吴铁城、孙科、陈树人、杨庶堪、邓泽如9人;候补委员有李大钊、汪精卫、古应芬、许崇智、谢英伯5人,聘请鲍罗廷为顾问。

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政府财政厅召开,由廖仲恺主持,参加者有100多人,讨论了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及工作步骤。

28日,临时中央执委会正式成立。11月8日,林直勉、谢良牧、

冯自由、徐苏中、林云院五人增选为候补委员，加紧改组的筹备工作，例如起草宣言，党纲及党章；办理各地支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区党部；同时筹划建立讲习所，培养各地支部执行委员等，并且决定1924年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11月12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

同时，会议还颁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当11月29日林直勉、邓泽如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极力反对联共改组，要求弹劾共产党，孙中山没有念及与邓泽如是多年亲密革命战友的关系，在信中对他作了严重批评，指出国民党组织及所制定的党纲党章是“我请鲍（罗廷）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切不可疑神疑鬼”。“我国革命向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

大半辈子光阴千辛万苦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良药的孙中山结果是一次次地失败，孙中山在彷徨、徘徊之际从苏联人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正是在无数次巨重失败流血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苏共的帮助下确定下来的。但同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仅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能完成的。

国民党的实力人物刘震寰、杨希闵、范石生等拥兵自傲，根本不可能真心真意听从孙中山的指挥；国民党元老人物胡毅生、李石曾、谢持、冯自由、邓泽如、张继、居正、戴季陶等则是从骨子里就反对三大新政策，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阻碍国民党改组的势力。

李烈钧、许崇智则是表面上服从改组政策，而心里则有自己的另一套算盘。

国民党内仅廖仲恺、何香凝、柏文蔚、邓演达、宋庆龄等积极拥护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只能以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为主力，1923年底相继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准备事宜。

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165名代表到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参加会议。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

1月20日下午,孙中山又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提出:

“我们秉政时的南京政府,只得三个月,到了北京政府的时候,政权都归于反革命手内。此后,革命党在政治上就没有建设的机会。”

“中国之革命党,经验不多,遂令反动派得尽其技,没有俄国那种好办法,以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从中破坏,故俄国虽迟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而仍失败。”

“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来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来改造政府。”

当会议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交付审查时,孙中山作了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说明: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大会通过了这一提案。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批判了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以及商人政府派的空言和谬论;制定了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内外方针;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中国国民党有了一个适应时代和革命需要的主义,并且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及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等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月31日,孙中山主持中央执、监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组建中国

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推举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谭平山、廖仲恺、林伯渠分任组织、工人、农民部长,戴季陶、邹鲁、许崇智分任宣传部长、青年部长、军事部长。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胜利完成和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孙中山实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变。国民党一大及其各项重要决策,体现了革命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政策上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最大特点是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紧密相结合在一起的。

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就是要在国际上联合社会主义苏俄,使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合在一起;在国内,则要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同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新三民主义以三大政策为革命灵魂及革命纲领,反映了新时期中国革命的鲜明时代特点和阶级阵营。

国民党一大宣言所解释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就成为第一次国共的政治基础及国共两党共同奋斗的纲领。

廖仲恺夫妇为国民党改组及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所作出的贡献是卓著的,有口皆碑的。

国民党改组后,焕发了青春,显出了勃勃朝气。在中共及广大工农群众的帮助支持下,中国国民党迅速掀起了国民革命的新高潮。

筹 建

1924年5月2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即黄

埔军校校长)。多年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却没有能结出辉煌的果实,孙中山采用一派军阀去打击另一派军阀,而当军阀摇身一变之际,孙中山就只有仰天长叹无可奈何。因而,没有一支坚强的军事力量作坚实的后盾的孙中山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积极筹办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且决定利用黄埔岛上原有的广东陆军军官学校作为军校校舍,由于军校设在黄埔岛,故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里,乘汽船一小时可到。它四面环水,南连巍峨的虎门岛,为广州的第二门户,地势十分险要,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你乘船从珠江口进入,虎门要塞犹如两颗虎牙把守着水道。过了虎门,水道顿形狭窄,映入眼帘的就是长州要塞——黄埔岛了。

黄埔岛风景秀丽,岛上林木葱茏,山势起伏,地势由北往南而倾斜。岛上仍保存不少鸦片战争以后建立的炮台,那些大炮还是从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进口的,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武器。炮管口径竟能容一个孩童轻松地爬进爬出。但是,用今天标准看,这些大炮已经够落后了,炮弹上膛全靠人工搬运。特别是发射时,还得用火药包引发。

岛上也住有居民,据说要塞的防守制度还是根据林则徐制订下来的规矩,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平时是居民,战时是军人。因此,可以说是全岛皆兵。

孙中山之所以选定黄埔岛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是经过详细考虑的。最初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争论颇多,因为驻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力量都办有军事干部学校,有粤军西江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湘军讲武学校、大本营军政部讲武堂等等不一而足,谁不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就有人主张在上述军校中选择一个加以扩充。而谁都想将未来的新军校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孙中山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就是想建立一支真正的属于革命的武装而不愿再走过去“借窝孵蛋”的老路。对这些建议的背后目的,自然洞若观火。唯其如此,新的军校才务必须与各派军阀斩断纠葛。因此终于作出最后决定,将校址选在黄埔岛。